

# 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

李吉荪

1960年，唯真的《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刊出(以下简称唯真文)。<sup>①</sup>1987年，《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一书中收入唯真文，用刘斐名刊登。<sup>②</sup>文中有刘曾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问题。1987年6月，王序平、刘沉刚著《刘斐将军传略》将唯真文编成蒋介石、刘斐等人对话。<sup>③</sup>数十年来，“三次高级幕僚会议”被称为亲历见证。史学界相互引用，文艺界添增描绘，似乎可作历史定论。

然而，历史是否如此？细察详查，疑点甚多，值得深思探讨。现先摘引唯真文：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大约是十一月十四日召开的)，只有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总长)、徐永昌(军令部长)、刘斐(作战组长)等几个人参加……

蒋这次的决定，显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

① 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页。

② 刘斐：《抗战初期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0页。

③ 王序平、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6页。

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与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七十八军宋希濂是调南京整补的……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又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要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并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sup>①</sup>

但直接参加南京防守决策的将领与部署南京战役的人，记述显然不同。

关于南京防守问题，蒋介石是找过不少人商议。除唯真文所列之人外，有文可查的，还有李宗仁、刘湘、黄绍、王俊、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虽然在桂系人员中也流传着与唯真文相类似的“高级幕僚会议”，但时间、背景、情节等却不尽相同。现举几例，以供探讨。

### 一、李宗仁在记述蒋介石曾邀请他与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

<sup>①</sup> 唯真：《抗战初期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括号内文字引自前述刘斐、王序平、刘沉刚文著。

徐永昌及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参加研究南京防守对策时，没有提及有刘斐参加。他在会上讥讽唐生智承诺固守南京时说：“孟潇，你了不起啊！”他还说：“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sup>①</sup>

二、白崇禧是奉命协助唐生智作南京战役部署和战地视察的人。白也记述有过类似李宗仁所参加的会议，但时间是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上海是11月9日命令转移阵地，11月11日上海市长宣告上海沦陷。《刘斐将军传略》亦记述蒋介石“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线撤退”。<sup>②</sup>另外白也和李宗仁一样，记述中没有提及与会者有刘斐。但写明有军委会第一副部长王俊出席。其文如下：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等……唐生智起立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sup>③</sup>

三、唐生智是决策南京防守的重要人物，他记述研究决策南京防守的过程如下：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698—700页。

② 王序平、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第72页。

③ 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sup>①</sup>

唐生智时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负责执行作战计划,当对南京防守决策过程十分熟悉,但他却从来没有提起过11月中旬还有唯真文所述“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唐所述上海撤退时参加由蒋介石召集的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出席的研究南京战略的会议,与李、白相同,没有提到刘斐。

四、谭道平时任军委会执行部作战科长,转任南京卫戍司令部作战科长。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6日,谭受命往前线视察苏州国防工事,8日,回南京,立即投入草拟南京防守作战方案。1946年,谭著《南京卫戍战史话》出版,该书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核准刊行。其中记载:

(1937年11月)九日晚上,我去晋见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将军,把整理的视察报告呈出……唐生智肃然地说道:“……战争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我们业经决定放弃上海。往后,战争是将降临我们门口,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不能轻易地把他奉送给敌人,保卫的责任,现在毫无迟疑的,要我们来担负……

在散会以后,才知道唐将军当时(两处重点为笔者所加)已向委员长报告过,愿意接受守卫首都的责任。

十一月十一日起,执行部开始计划守城的准备。<sup>②</sup>

① 唐生智:《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九年概括回忆几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47页。

②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年版,第45页。

谭的记述时间距史事发生较前几种记述要近得多,因而准确性应该更大。

刘斐是8月4日与白崇禧一同到南京,后在军委会第一部下属作战组任职。对当年战备、淞沪围攻、主力西撤皖浙赣等既定战略方针不甚理解。据查,由何应钦从7月11日起所组织的统帅部每日例会,白崇禧是8月4日后开始参加,执行部的作战科长谭道平几乎场场都到,但未发现有刘斐出席。据此,若按唯真文所述,在诸多一、二级上将,军委会常委、部长面前,虽则第一部部长黄绍正在山西前线,但副部长王俊仍然在座,由一名第一部属下的作战组中将成员来发表与当年既定战略方针不同的长篇议论,显然与当年官场常情不相符合。尤其是改编成对话的关于“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的叙述,其中增加了一段何应钦与刘斐争论有关“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同敌人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大战,日全军覆没”的对白,姑且不论所争的事情谁是谁非,仅就争论能否发生而言,也是令人怀疑的。按理,刘斐是知道当年蒋、何等人对平型关战役是如何评价的。即使刘斐敢于顶撞,作出“中央军”不如“红军”的结论,蒋介石能允许在他面前那样争论吗?根据唯真文而来的这种戏剧化的描绘,不合常情,因而也不足为信。

至如唯真文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的时间安排在11月中旬,是时李宗仁已去徐州;唐生智、白崇禧已在部署组织战役;由执行部改组扩充的南京卫戍司令部已在草拟作战计划。同时,陈诚、顾祝同已将淞沪撤下的主力部队,按既定战略方针调往皖南、浙西准备新阵地。而日军第十军19日晨占领嘉兴后,其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决定“军于19日晨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sup>①</sup>在如此背景、军情之下,才出现“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问题,实难以置信。

<sup>①</sup>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汇篇·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

综合以上情况,从时间、空间、常情、军情诸多客观条件来分析,均不可能产生唯真文那样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作者单位: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刘兵)

· 简讯 ·

## 台北出版《日军在台湾(1895—1945)》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刘凤翰教授所著《日军在台湾(1895—1945)》,于1997年6月在台北出版,全书50万字。著者利用中日双方之原始军事档案,经深入研究,详实记述了日军占领台湾之军事措施与主要活动,内容包括:日军侵占台湾与早期军事部署;七七事变后台湾日军之转变;协助军事占领台湾之宪兵、警察与保甲;日军在台湾所建要塞、军港与机场;日军后勤、交通、通信、卫生,及其兵役行政与组训民众;日军以台湾为南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日军从越海远征到本岛防御,终至日军无条件投降与遣返。全书作动态撰述,不特让读者见到珍贵史料,亦在动态中得知历史之转变。

(以林)